

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的故事

郭海南

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建

1947年,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,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战略反攻,全国解放已成定局,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国家建设都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。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,将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,同时提出创办大党校、大军校、大党报的建议,得到毛泽东的赞同。

1948年3月底,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会见了叶剑英,告诉他:今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,我们的干部缺少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,需要重新学习。中央拟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,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,你看怎样?叶剑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。5月9日,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城南庄会议决定,发出了《关于改变华北、中原解放区的组织、管辖地及人选的通知》。通知要求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,并成立华北中央局、华北人民政府、华北军区等机构,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、大军校、大党报。

为了工作方便,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华北局委员,按照创办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,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、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、陆军中学、青年教导团5个单位合并组建华北军政大学,校本部驻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,管辖周围的陈庄、西兵营、南兵营等多个教学点。

1948年5月23日,叶剑英来到南新城村,华北军大的筹建工作由此拉开序幕。6月11日,华北军大在南新城村西的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800多人参加的大会。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正式宣布军大成立和人员任职命令。叶剑英任华北军大校长兼政委、萧克任副校长、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学校下设政治、教育、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,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,校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。

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、经历各不相同的情况,华北军大对全校学员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。全校学员编成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。八个大队分别是:一个团级干部大队,两个营级干部大队,一个政治干部大队,一个青年大队,一个参谋大队,一个工兵大队,一个炮兵大队。三个直属队:台湾队、华南队及高干队。

1948年7月1日下午5点半,华北军大隆重举行庆祝“七一”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、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、华东、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出席大会。朱德总司令在叶剑英、萧克、朱良才的陪同下,乘坐吉普车检阅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。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北军大的成立表示慰问和祝贺,他指出: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,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,任重道远。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,把学校办好,为人民立功。



1950年5月18日,在华北军大毕业的台盟盟员。

1948年5月,华北军政大学(简称华北军大)应运而生,并迅速发展壮大,成为我党我军当时办学规模最大的军政学府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。我们重温当时在华北军大学习的台湾队学员和教员的故事,可以体会到他们心系家乡父老,肩负职责使命,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生命赞歌。



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,台盟盟员林东海(右二)、林云(左二)与战友陈增坤(左一)、廖先景(右三)、郑森洲(右一)等代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向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献旗,表达“打到台湾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决心。

台湾队学员和教员

为了解放台湾准备干部,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,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。1947年5月,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拔,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,后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。据田富达回忆:

我们打下汤阴以后,准备过黄河,部队下令让我们台湾籍的战士集中,要送我们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。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去,个别有技术的,像炮兵、会开车的,前线有需要,他们就跟着南下。当时我们感动得都哭了。离开战友撤离前线,我们还真有些不舍。那时发生了“二·二八”事件,中央3月发表社论,传达前线已经是5月了。传达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,所以大家都很感动。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,当时在那台地区的南固县,后来刘邓部队过黄河南下,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。军大离运河很近,我们在军大文化、学时事,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,为了配合土地改革,正好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,我们也学习。那时我普通话水平不太好,慢慢听,慢慢提高。

1948年1月,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。之后,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,他们经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,经由韩国仁川到达胶东解放区。10月,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,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。

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,专门接见了他们,并同他们共进晚餐。林东海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汇报。叶剑英鼓励他们说:“出身不由己,道路可选择。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,但毅然参加革命,说明你的决心很大,

新中国成立前夕,谢雪红和杨克煌专程赶到石家庄看望全体台湾队学员,同时找台湾队副队长廖先景和指导员张省吾商量,说是台湾队学习快要结业了,大家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,是否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时,派几位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、毛主席献锦旗、表决心。“这个主意好!”廖先景和张省吾一听连连说好。

经过商量,林东海、林云、陈增坤、廖先景、郑森洲等战友被推选为台湾队的代表,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献旗。当他们走进会场时,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廖先景和战友们激动地走上主席台,把一面绣有“愿在你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”的锦旗献给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。

廖先景回忆道:“毛主席要我转达他对台湾队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,勉励我们要努

力学习,练好本领为解放台湾、解放全中国作贡献。在主席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周恩来、刘少奇等都与我们的手握手。我做梦也想不到,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被强征去当兵受尽折磨死里逃生,台湾光复后又又被国民党军队当兵,再被送来大陆参加打内战的我,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、共产党员,还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,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,也是台湾队全体同志、台湾人

特别激动,她抚摸着石狮反复说,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,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

中午时,他们到达长辛店槐树岭。午饭后,郑励志告别了谢雪红一行,独自到军大第一总队接受入学考试,并被录取。第二天,他带着行李到华北军大报到,行前向谢雪红辞行。谢雪红一再叮嘱他:要学好本领,打回老家去。

谢雪红等台盟领导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的学习和生活,常常写信给他们。她在信中写道:“听说,你们成立研究小组,我是很赞成的。可是,我希望要着重学习把握各种政策,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教训,并平常考虑各项政策应如何在台湾实行,研究具体办法,这是最重要的。”当得知台湾队有些同志身体很差时,谢雪红谆谆告诫他们:“我特希望你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。因为如身体不好,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出来,将来的工作必然的时时刻刻都要忙,都要很紧张,所以需要强壮的体力才能执行。以这样说,你们不要以为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‘个人主义’,绝不是的,你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你们自己的,应该要好好的照顾。”

台湾队成立以后,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。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,但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普通话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,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,收获甚微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,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,借调台籍干部杨诚同志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,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。杨诚来了以后,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,因材施教。选聘会讲闽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,提高学员听课效果。当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、冯志坚、林云、朱天顺等,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,很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。

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,在其鉴定材料中写道:“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,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,建立了初步基础,我们深为感谢。”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时,深情地说:“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委在台湾队的时间,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,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、对台籍干部的培训,花费了不少心血,作出过重要的贡献。”

向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献旗

民的光荣。可惜由于我们的心情过于激动,竟把战友们委托我在见到毛主席时代大家问候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”随后林云代表台湾队学员向大会宣读了“打到台湾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决心书。

台湾队学员献旗结束后,谢雪红、杨克煌、李伟光、王天强、田富达、林铿生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表,纷纷跑过去与他们亲切握手。李伟光回忆道:“不仅是几位参加政协代表或台湾队同志们的光荣,更是650万全体同胞的光荣。”

参与筹备新政协、见证新中国诞生

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期间,周恩来询问台湾省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,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为,台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,一直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,故可考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来参加会议。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。6月19日,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《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(草案)》的说明,提出:“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:九三学社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。”同日,会议通过《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》,决定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,代表名额5人,候补代表1人。其中5个代表中要有一个台湾高山族。

据田富达回忆:“汉族的同志好办,有谢雪红、杨克煌、李伟光、王天强,但是高山族的代表需要寻找。谢雪红提出战争时代有不少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部队里,只不过太分散了。她先跟华东局谈,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。这时,中央统战部提出,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,里面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班,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找看。这样就委托华北军大找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班。班里一讨论,大家都推选我。我说我不行啊,因为有几个比我先入党的,还有一个是副区队长,是阿美人,我听说他的水平高,曾经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过,但是最后还是定了我去当这个代表。”

1949年9月21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。谢雪红、杨克煌、李伟光、王天强、田富达、林铿生(候补代表)作为台盟代表出席了会议。9月22日,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,田富达在宣言起草委员会。9月27日,台盟代表田富达在大会发言,他说:“我是参加政协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单位中的少数民族——高山族人民的代表。在这个会议中有人口仅30万左右的高山族人民自己的代表参加,使我极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无限的兴奋与光荣!”

10月1日下午,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。田富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其他政协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。当天,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。他们站立在金水桥畔东面的华表前观礼,不论是观看天安门城楼,还是观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。台湾队学员王宏回忆道:“这一天,我第一次远远地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,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息。之后,台湾队前往北京郊区长辛店的华北军大分校。11月,朱德总司令来出席台湾队的毕业典礼并与大家合影。我们拿到的是一寸黑白照片,至今仍仍然珍藏着。”

“要打回台湾去”

1949年11月1日,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。谢雪红、林铿生、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。朱德讲道:“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,要打回台湾去,这是同学们的希望,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。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,包括台湾在内,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。”那时天气已冷,朱总司令勉励的话语深深地温暖了他们的心。

谢雪红接着指出:“目前的台湾,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,施行残暴统治,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。因此台湾人民在迫切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,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你们的朋友们。”林铿生讲道:“中央人民政府首长们对台湾的解放如此关心,我代表台湾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。同学们在军大的培养下,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,这是各位同学们的收获,要把这带到台湾去!”林彰彰代表学员表示:“我们要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,完成艰巨而伟大的进军任务。以解放蒋匪最后基地台湾,粉碎美帝的侵略阴谋!”大会在热烈的口号声中散会。

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,纷纷南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,为解放台湾做准备。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,美国政府从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,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,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,致使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停止。华北军大台湾队的学员们有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,有的到华东革命大学继续深造,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,并逐渐成为对台工作的骨干,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。

(作者单位:台盟中央宣传部)